

中和◎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國的誕生

中和◎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诞生/中和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309-10170-6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历史-研究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5928 号



中国的诞生
中和著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35 千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170-6/K·459
定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这本书实际上是我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学术思考的理论总结。

1997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但我的理论志趣一开始就不在于直接研究马克思或其他某个人的学术思想,而是希望以马克思的思想作为指南或方法,对中国文明道路进行某种新的解读。这种努力的阶段性成果是我的博士论文《地理环境与夏商时代》。博士论文研究的主要收获,是我明确地意识到中国文明的早期即从史前到夏商是一个以解决物质生产的技术问题为首要任务的时期,我当时称之为“专家时代”。在技术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中国文明才开始转向关注秩序与道德问题,我当时称之为“道德时代”。

博士毕业之后,由于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我得以更从容、更深入地展开这种学术思考。我首先需要解决的疑难,是中华先民在生产中究竟依次遇到了哪些技术问题,以及他们如何解决这些技术问题。这种思考不仅让我意识到龙、凤崇拜的意义是通过闪电与家燕崇拜的方式确定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开始——这是在博士论文中就有的收获,尤其使我逐步意识到洪水记忆、鲧作城和大禹治水这一系列传说的真相是反映了中华先民开发华北低地即现今华北平原的艰苦努力和伟大创举。以此为基础,我开始把中国文明的起源理解为龙凤呈祥,即华北地区东西部龙、凤文明在开发华北平原过程中实现的族群与文化融合。至此,我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脉络形成了基本清晰的认识。不同于我在博士论文中对早期社会的“专家时代”理解,我现在把中国早期社会称为中国农业文明的“技术化时代”。

不过,当我试图按照马克思的教导主要通过物质生产的水平和状况来



理解中国文明在西周时期开始出现的人文主义转向时,我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因为仅仅从物质生产的技术与水平很难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中国文明从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制度发明与思想创造,而那一时代的制度与思想发明实际上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高度稳定性的“中国文明”的主干。这种困惑甚至一度让我的思考陷入停顿,直到我“突然”意识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从来就不仅仅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而是包括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在内的双重生产,而且,人口生产的意义主要在于为人类社会的道德与政治生活提供了现实的范型与理想。基于双重生产这一新视野,我把从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文明发展称为中国文明的“伦理化时代”,即用人口生产的特定组织形式与价值观念来组织社会,以努力把人口生产中天然具有的善引入到主要以财富分配为主题的公共社会生活,从而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从技术化时代到伦理化时代,一个很重大的社会现象是,在技术进步的社会地位明显步入下降通道的同时,社会的道德自觉即对道德与人文价值的强调则进入上升通道,社会精英分子的主要心思集中在如何建构与维护某种稳定或正义的社会秩序,即进行制度与思想的发明。

中国文明在伦理化时代最后实现的制度发明,主要是家庭生产的经济制度与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最后实现的思想创造,则是以儒道法为主体、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系列伦理与政治思想。儒、道、法三家都不怀疑家庭这一人口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对于构建帝国政治与经济制度的重要意义,因而都主张帝国应该采取小农经济形式和“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但他们对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即家庭生活的价值观念能否上升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各有参差。大体说来,儒家坚信可以而且应该通过把家庭生活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来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主张用管理家庭的方式来治理社会;道家则对之持怀疑态度,主张小国寡民,尤其认为国家应该少管闲事,尽量无为而治;法家则完全不相信能够借助家庭生活的伦理原则实现社会即无血缘关系人群的有效治理,认为只有严刑峻法才能达到良好的社会秩序。通观中国在秦汉之后的制度与思想,不仅帝国制度在整个

帝国时代始终如一，帝国思想也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同时兼顾道家和法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帝国时代的到来称为中国的诞生。

当初决定写这本书的动机，本来只是简单地想把华夏先民如何从草莽洪荒中开创中华帝国的道路大致清晰地勾勒出来，既作为一种思想的自娱，同时寄托对先辈们的缅怀。但是，随着研究的逐步展开和不断深入，我的志向也日益膨胀起来。我越来越相信，中国文明从技术化时代到伦理化时代的这一发展轨迹不仅对于其他同时代的农业文明可能具有普适性，而且尤其对于理解从西方兴起的工业文明的历史与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种信念，我把当下的工业文明称为工业文明的技术化时代，并且相信，工业文明也将在不久的未来实现从技术化时代向伦理化时代的转变。很难预言这一转变的具体情节，但是我直觉，中国农业文明曾经走过的道路尤其是中国文明的家庭伦理选择应该具有相当的启示与借鉴。

虽然中国向来的历史家都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豪情，但历史家的主要任务应该在于品评故事。因此，如果这本书对于中国诞生这一宏大历史主题的叙说多少具有独到的创意，我就感到由衷的满足和欣慰了。

不过，我不是一个历史研究的专门家，在对史料的把握与运用方面也许有不少不足与不当之处，尤其是我的有些奇想肯定大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因此，特别期望得到读者与方家的指正。

中 和

2013年12月1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1
导言 理论与方法	1
一、西方思想对文明道路与人类历史的主要思考	3
1. 黑格尔	3
2. 马克思	4
3. 韦伯	7
4. 雅斯贝斯	9
5. 技术崇拜与技术批判	10
6. 民主崇拜与民主批判	13
7. 自由、平等与正义	18
二、两种生产与文明研究的新视野	24
1. 两种生产	25
2. 人口生产的社会意义	26
3. 物质生产与技术化	40
4. 人口生产与伦理化	45
5. 文明的停滞或可持续发展	50



第一章 父精母血——龙、凤崇拜	57
一、凤是什么	58
二、龙是什么	62
三、“前中国时代”的龙凤文化区域	66
四、早期龙凤文化的考古学特征	69
1. 凤文化的特征	69
2. 龙文化的主要特征	70
五、龙凤崇拜与中国文明的诞生	72
附论：酒、爵及与龙凤崇拜的关系	77
第二章 中国诞生的地理学进程——从龙飞凤舞到龙凤呈祥	83
一、龙飞凤舞：“前中国时代”的文明状况	84
二、龙凤呈祥	91
1. 文献中的洪水与古城	91
2. 考古发掘中的古城与洪水	94
3. 史前洪水的性质	95
4. 古城、治水与文明起源	100
第三章 中国诞生的技术化进程——从技术统治到抵制技术	109
一、中国农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轨迹	110
1. 史前时代的技术进步	110
2. 传说时代的技术进步	113
3. 夏商时代的技术进步	114
4. 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的技术进步	119

二、技术进步的社会地位	122
三、技术统治与技术的意识形态化	126
第四章 中国诞生的土地制度与生产组织形式的演进	
——兼论井田制是小农经济时代的空想	131
一、商代——绝对社会化大生产	132
二、西周——相对社会化大生产	136
三、春秋战国——小农经济的诞生	141
附论：井田制是小农经济时代的空想	145
第五章 中国诞生的政治学进程——从原始民主到君主集权	151
一、传说时代的禅让——族际民主	153
二、夏商时代——龙、凤文化族群分别垄断华夏联盟最高权力的时代	158
三、西周——大国时代的开启与家族伦理化时代	167
四、帝国时代与家庭伦理化时代	174
1. 完成统一的力量选择	177
2. 走向统一帝国的程序	179
3. 帝国的制度与思想	182
第六章 中国文化的生活智慧与社会理想	187
一、中国文化的和平主义精神	188
二、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伦理主义文化	193
三、对自然的谦卑与永续利用	211
第七章 中国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215
一、西方文明道路及其帝国主义品格	217

二、中国文明道路及其和平主义品格	238
三、中国道路的可能路径	243
后记	263



导言 理论与方法

中国文化是人类少有的几种伟大的民族文化之一。这既由于它悠久的历史及其在历史上的强大,更由于它独特的历史经验与文化创造。中国文化不仅有完全独立的起源、成长与成熟的过程,而且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经久地保持其在成熟期获得的精神品格,自主从容地在东方绵延,直到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与之相遇。虽然古老的中国农业文明不可避免地被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打败,但中国文化的正脉并未受到根本动摇。相反,中国文化的各种品格却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相互激荡磨砺的过程中,通过内在的文化反思与外在的文化比较不断得到呈现。随着从西方发端的现代工业文明日益展露出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病症,很多人都期待古老的中国文明能够重新焕发,以其固有的文化品格弥补当代文明的缺陷,引领人类文明达至新的境域。

但是,由于没有实现对中国文明发展道路的真正理论自觉,世人的期待最多还是一种朦胧的直觉。因此,清晰地展现中国文明的发展道路与文化品格,具体地说,中国文明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道路以及这种道路的历史逻辑,中国文明具有哪些文化品格以及这种品格的历史必然性,并以此为基础,探析中国文明道路及其精神品格对于当代工业文明的意义与启示,既是当代中国思想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国思想对人类文明应有的贡献。

人们非常有理由表示强烈的疑惑,为什么具有强大历史传统的中国文明居然没有达到对自身发展道路与文化品格的理论自觉。实际上,不仅中国文明如此,其他人类文明也莫不如此。在工业时代之前,世界各主要农业文明都是特定地理环境的产物,其生存与精神状况极其深刻地受到特定地理环境的束缚和影响,虽然不同地域的文明之间存在着或频或疏的交流,但各主要文明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注定是外在的。因而,在农业时代还只能产生与特定地理环境或特定生活方式相关联的民族历史意识。而民族历史意

识本质上是各民族文化发展即将终结之际的产物——中国的第一本历史著作叫《春秋》，据说它是孔子对鲁国《春秋》改编的结果——它倾向于把最终实现或获得的思想成就不仅当作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是由来已久的，这就使民族历史意识从根本上屏蔽了对民族文化发展道路的真理性思考。对农业文明发展道路的所有有见地的理论思考都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开始出现的，迄今不到两百年左右的时间。从那时开始，通过工业的纽带，世界各主要文明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了解不断深入，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在各民族历史意识相互汇通的基础上，超越早先各自**民族历史意识**的局限性，孕育和建构某种共通的人类历史观念：在实现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明确理论自觉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关于人类生活的共同价值观念。这就印证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①尽管人们目前对这种人类历史意识的具体内涵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人们普遍相信，这种人类历史意识的达成是完全可能而且必要的。关于“普适价值”与人类共同未来的各种思考可以看作是这种人类历史意识诞生的前兆。人类历史意识的最终形成也将意味着工业时代的终结。由于西方是工业文明的故乡和当代文明的表率，此前对文明发展道路与人类历史意识的真理性思考大部分是西方思想的贡献。

一、西方思想对文明道路与人类历史的主要思考

1. 黑格尔

黑格尔可以看作是对人类历史意识自觉的开始^②。他认为，绝对理念或世界精神是世界历史的本质，它在历史中表现为“自由意识”，世界历史就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3页。

② 在黑格尔之前，17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德国思想家康德、赫德尔都从不同角度探讨过世界历史。但他们重点还在关心“民族化”问题，还没有形成关于世界历史的比较系统的看法。



自由意识的进展。自由在人类历史中对偶然“意志”的扬弃,决定世界各个民族都将走上世界历史的道路。他毫不掩饰他对于自身民族历史意识的自豪,他把东方、希腊罗马、基督教日耳曼世界看作人类精神发展的三个递进的阶段,即东方各国只有一个人(专制君主)是自由的,希腊罗马世界只有部分人是自由的,基督教日耳曼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则是所有人都自由的,因为他们都意识到自己的自由。他说:历史“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①。不过,一方面,黑格尔对东方尤其是中国文明的了解实际上极其有限,而且在他生活的时代,工业文明也还刚刚开始其千里扬帆的发展进程。人们虽然已经开始世界历史自觉,但真正的世界历史意识还在乌有之乡。他用抽象玄妙的“绝对精神”或“自由意识”来概括世界历史意识的内涵,正好显示了此时世界历史意识的空疏。

2. 马克思

马克思是世界历史意识最重要的奠基者。他破除了黑格尔及其他一切对于历史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理解,第一次把它建立在实践即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他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马克思把实践主要理解为社会物质生产:“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第148—1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页。

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这就是马克思发明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基本思想。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最伟大的思想成就。唯物史观一经问世,就成为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理论范式。在马克思以后,任何对世界历史意识的有价值的思考都不能无视马克思的思想创造,物质生产的性质与发展状况成为理解所有人类历史的坚强基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马克思第一次对工业文明展开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批判。一方面,他意识到工业资本主义实现了财富的巨大增长,他把财富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与社会化大生产。另一方面,他认为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社会不公。他发明的剩余价值学说特别指认私人资本实际上是掠夺与剥削的结果。他尤其认为,工业资本主义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其效率也是阶段性的。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不仅严重影响社会的财富增长,而且将演变为全面的政治危机并最终导致工业资本主义的灭亡。他预言,在工业资本主义废墟上建立的将是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他称之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将超越以往民族历史的局限性,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开始,其基本特点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变成社会公有。由于共产主义克服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之间的矛盾,所以共产主义既是高效率的,也是公正的。马克思预计,那是一个财富不断涌流因而能充分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即实行按需分配的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应该是由物质生产在工业时代的早期发展阶段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的理论思考过分专注于物质生产领域,这使得唯物史观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首先,人类社会从来就存在多种性质的社会关系,但既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能够归结为“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关系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就不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家庭关系可能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具有永恒性与重要性的社会关系,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但它完全不能归结为生产关系,而且基本不受生产关系变动的影响。其次,人类文明的相当一部分思想或意识形态也主要不是物质生产的产物,如美感、羞耻感、道德感。最原始的物质生产阶段就开始有美的追求,但很多时候完全看不出这种追求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如很多原始民族喜欢用彩色泥巴化妆。完全不是为了御寒,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嫌麻烦地以某种方式遮掩生殖器。无论怎样(生产)落后或先进的民族,父母对于子女的爱都是同样的。而且,并不是物质生产越发达的民族、地域或时代,就越具有美感、羞耻感与道德感。再次,尽管农业社会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点,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也不是他的主要思想成就,由于唯物史观实际上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普遍的框架,因此他的著作中并不缺乏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论述。在1849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说:“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①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又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但是,马克思的这些观点所澄清的事实比引起的争论可能要多得多。而且,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曾经强调,“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③,但伟大的思想通常都容易变成教条。他的思想后继者可能主要按照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试图把整个人类文明史划分为这样依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2页。

递进的几个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将来可能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不仅没有对农业时代各主要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至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迄今对中国文明的解释还很不尽人意——尤其缺乏对当代工业社会的建设性批判。最后,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指向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即少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大部分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他期望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来消除社会分裂,实现社会公正。但是,马克思身后气势磅礴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没有消除社会分裂,尤其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生产高效率。苏联的崩溃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不是宣告了公有制试验的失败,至少表明公有制并不比私有制更有效率、更加公正。马克思虽然意识到生产资料由少部分人占有和支配是阶段性的,不过,他对于大生产形式本身的有限性缺乏洞察。同时,马克思指望通过财富的极大丰富消除社会分裂,也让人们看不到现实的希望。工业时代以来的技术进步与财富增长即使没有从根本上恶化人类的生存境遇,至少人们已经可以有这样合理的判断和预期:财富增长可能很快就要达到其尽头。

3. 韦伯

如果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即生产力的进步来说明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那么韦伯则试图用人类行为的“理性化”来表征文明的步伐。韦伯认为理性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本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即以研究世界各大宗教的理性化进程,尤其是新的高级宗教如何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减少巫术和迷信成分,进化出一种普遍的伦理信仰为主题。受弗雷泽的影响,他相信巫术、禁忌也包括合理性行为。但他更强调高级宗教是由宗教先知创立,先知以自己超凡的品格和魅力吸引人们,提出预言和道德戒律,展示一种生活态度并赋予其神圣的意义和价值,让大众去追求和模仿。韦伯虽然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前资本主义时代各高级宗教(基督教、佛教、儒教)的主要特点是其理性化表现为伦理化,即提出了系统化、理性化的伦理教义与道德学说,但是,他没有具体指出这些伦理宗教诞生的内在历史逻辑,而是简单归结为宗教先知们的思想创造,这就有理由让历史唯物主义